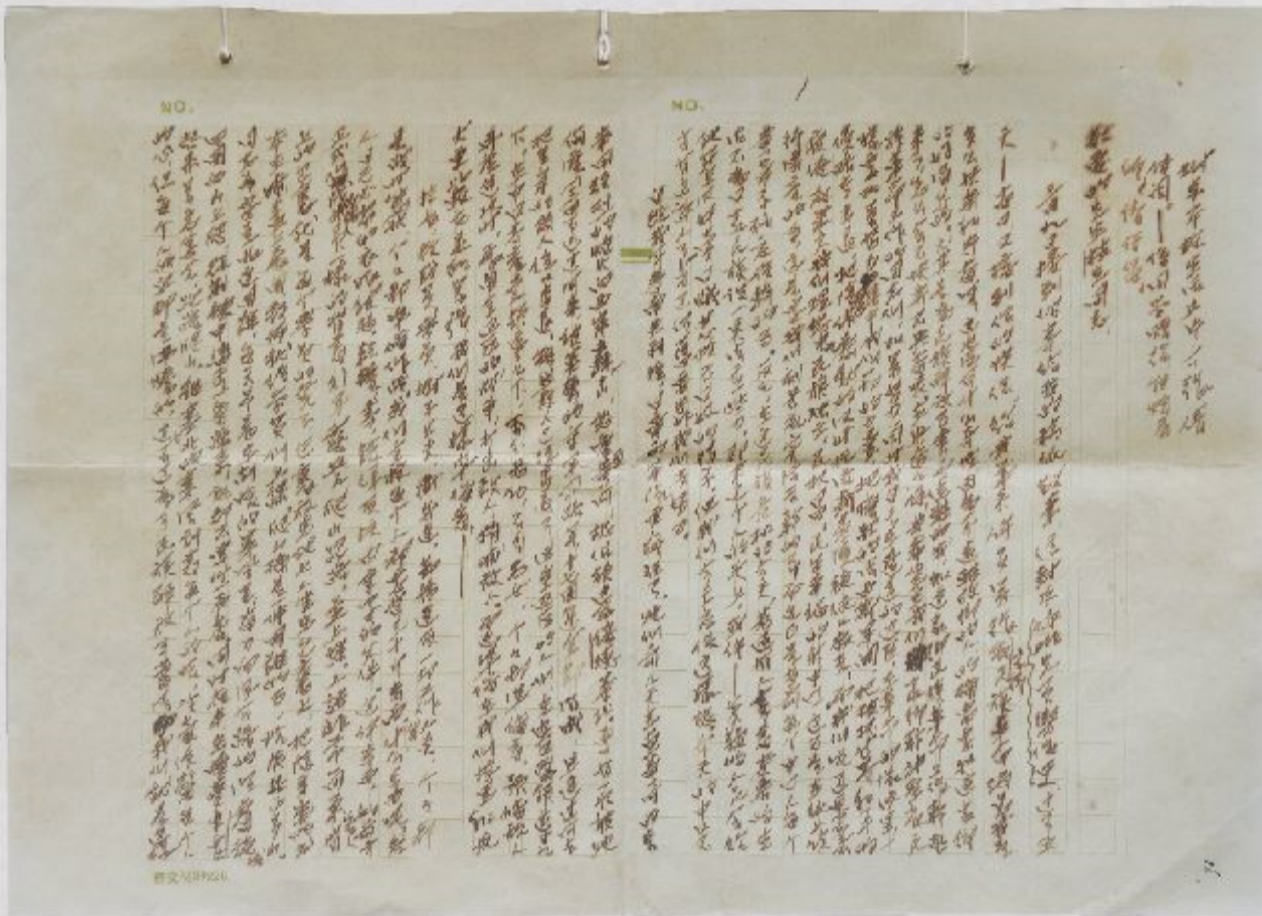


# 第一部分 柳夷书信

## 导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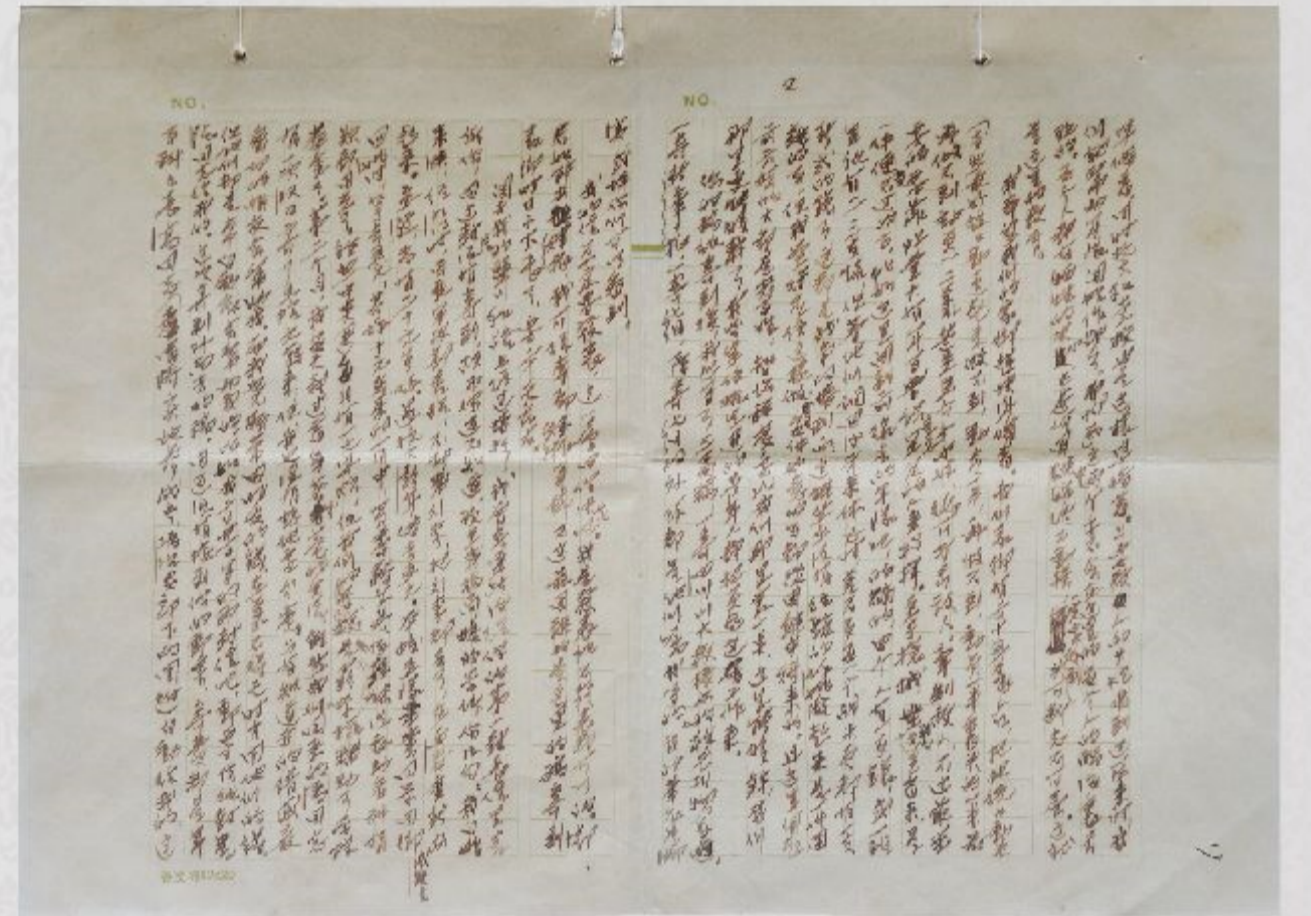
余姚素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就活跃在这块热土上。1937年7月7日，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顾全民族大局，与国民党再度联手，一致对外，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兴起。此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日益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抗日救亡圣地。一大批热血青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救亡的号召，肩负起历史使命，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千里迢迢投奔延安。于是，黄河之滨，宝塔山下，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余姚众多的热血青年也投身于抗日救亡洪流，有的抛家离亲远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柳夷就是其中一位胸怀大志、愿为抗日救国献身的余姚进步青年。在奔赴延安前，柳夷是余姚普文书局的店员，在业师姜枝先的引导下，阅读进步书籍，受共产党人的影响，已初具革命的理想。1937年10月，柳夷在中共党组织的介绍下，在业师、余姚普文书局经理姜枝先的鼎力相助下，毅然告别老母、妻女和众亲友，与同邑青年熊达人一起克服时艰，辗转千里，经汉口抵达延安，入陕北公学接受革命理论教育后，又担任本校教员。数月后，柳夷转入抗日军政大学接受军事、政治教育，毕业后转入八路军，从事干部教育。其间，柳夷与姜枝先鸿雁传书，互通音讯。幸姜枝先有心，长期保留了数封柳夷写给他的信，姜枝先逝世后，其子姜越才将这些信件慷慨献给国家，由余姚市档案馆保存。柳夷给姜枝先的信，对于认识当年余姚热血青年奔赴延安的时代背景、认识当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认识由红军大学更名为抗大后的教育历程、认识当年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日救国的人才而创办的陕北公学都具有极高的价值。柳夷的信同样具有史料价值，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对于澄清历史人物的某些生平事迹、以及一些历史问题具有原始的证据价值。因此，解读柳夷给姜枝先的数封信很有必要，也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保存在余姚市档案馆柳夷写给姜枝先的信有9封，现选择其中5封信，按时间先后，逐次释文及解读。

一、致姜枝先（1938年3月17日）<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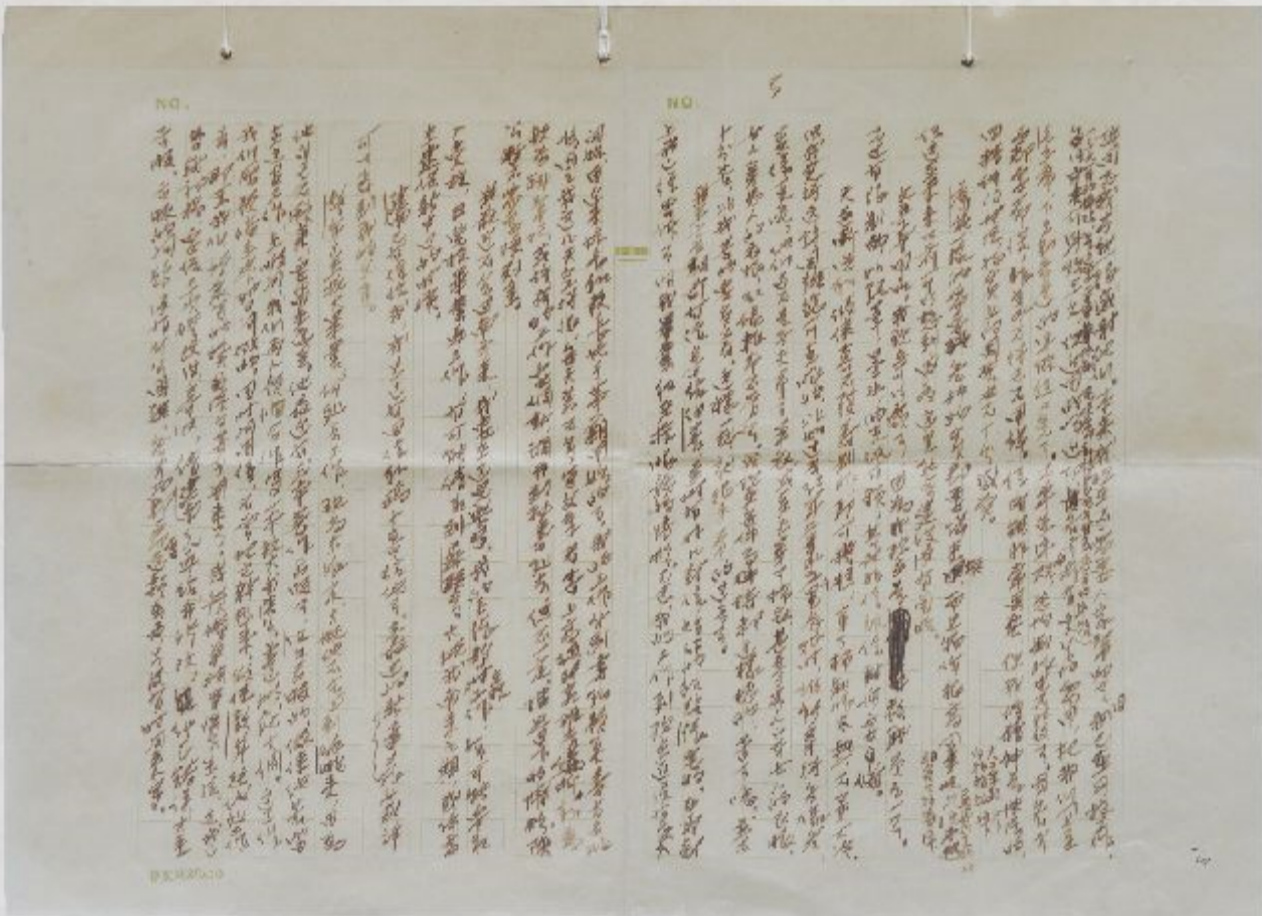
第一页

原件尺寸：267×194mm  
 档案编号：232-1-114-7-1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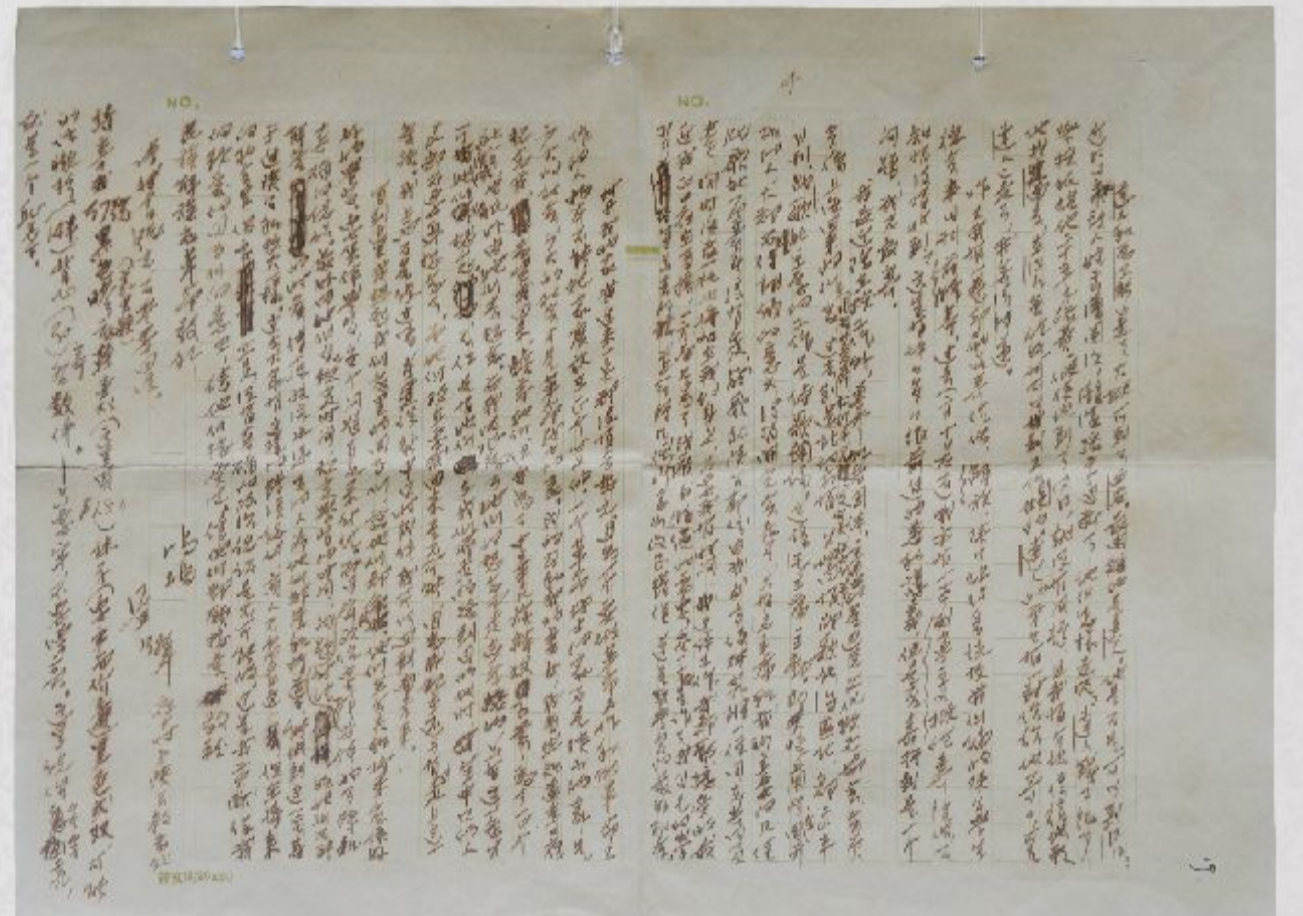
第二页

原件尺寸：267×194mm  
 档案编号：232-1-114-7-2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第三页

原件尺寸：267×194mm  
 档案编号：232-1-114-7-3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第四页

原件尺寸：267×194mm  
 档案编号：232-1-114-7-4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信封

原件尺寸：89×149mm

档案编号：232-1-114-7-5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 释文

敬爱的先生枝先同志<sup>[2]</sup>：

三月九日接到你寄给我的稿子、铅笔、信封及《余姚先贤御侮史》<sup>[3]</sup>，过了五天——十四日，又接到你的快信，给我带来许多紧张家乡底<sup>[4]</sup>民族革命消息，我是多么快乐和兴奋呀！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一个远离故乡的人，的确需要知道家乡的好消息的。尤其是为民族解放事业而远离的我，知道家乡民族革命工作干起来了，怎么会不快乐不兴奋呢。在兴奋之余，我希望在我们家乡干神圣民族革命工作的同志们，加紧努力，同时我自己在辽远的边区<sup>[5]</sup>，在革命的队伍里，一样要加紧努力，集中我们一切的力量，把疯狂的法西斯军阀，把破坏世界和平的侵略者击退，把阴谋暴动的汉奸托洛斯基<sup>[6]</sup>匪徒统统杀光；而我们呢还要毫不疲倦地建立我们理想中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这不是在纸上说得漂亮的事，这是要我们刻苦底实际去干的事，而这正是当前每个中国人每个黄帝<sup>[7]</sup>子孙应该干的事。反之，在这民族危机的今天，若还有人享受着安乐的生活不为国家民族设一点法出一些力，那末这个人的头上，或许——无疑的人民会给他冠上汉奸卖国贼甘心做亡国奴的帽子<sup>[8]</sup>，但我们今天应该这样想，今天的中国不会有这许人了——不过仍旧要靠我们去努力。

自从我军晋南失利后，日帝的军队更疯狂了，他们前几天在古黄河的东岸用强力的炮火向西岸袭击，想渡过黄河，想占领边区绥德<sup>[9]</sup>等处。曾有一次被他偷渡（三四百人）过河来，被英勇的守军（八路军，十七团军）全部消灭，且追过河去，把东岸的敌人统统击退。虽然敌人已经击退了，但全边区的人们，在边区政府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个个都准备着，预备敌人再度进攻时，展开全边区的战争，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而这准备在我们校里<sup>[10]</sup>和抗大<sup>[11]</sup>更比较充足和紧张，我们是这样准备着：——

校长，教职员，学员，櫛[厨]<sup>[12]</sup>子火[伙]夫，卫兵连，勤务连及一切工作人员，个个都是战时状态，个个都准备作战。我们全校每个人都要背三十斤东西。背什么东西呢？各人自己必需品的衣服、被毯、干粮、书、枪弹及校

内重要的文件。这许东西，如前方正式作战的战斗员一样的背着行军露营，爬山跑路，并上课。上课非常简单：各人背上的包裹就是每个学员的凳子，包裹放在地上，人坐在包裹上，把随身带的书本在膝盖上展开，教师就给学员们上课。爬山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恰陕北正多山：同志为要克服这困难，每天早晨在削脸的寒风里，奋力向没有路的沿肤施<sup>[13]</sup>城四围的山上爬，从荆棘中踏出一条路来，谁都不曾叫一声苦。同时夜半，在睡梦中要起来紧急集合，跑路爬山。虽塞北的寒风刮着每个人的脸，冷气候袭每个人的心，但每个人的血都是沸腾的，这也不过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吧？我们就是这样准备着，同时抗大和党校<sup>[14]</sup>也是这样准备着。只要敌人的火炮飞到边区来时，我们就帮助军队开始作战了。而“怕死”这两个字不会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脑海里出现的。每个人都有牺牲的决心，在甚<sup>[任]</sup>何困难中始终不动摇，一定要做到头可断志不可屈，这就是这里的教育。

我希望我们的家乡赶快准备着。我们家乡有六十五万人口，把他统统动员（当然最好统统动员）起来做不到，动员一半，再做不到，动员一半里头的一半，若再做不到，动员一二万甚至五六千也好，总可打击敌人，牵制敌人，不过最主要要靠胆量大军事学识，意志坚定的人来指挥。至于枪械，在我们这里看来，是一件便当不过的事，比如这里开到前线去的军队吧，的确的，四个人有一支枪，或一班里祇<sup>[15]</sup>有二三支枪，但等他们调回后方来休息时，差不多每一个战斗员都有一支新式的枪了，这都是战争的胜利品。这虽然在没有经验的余姚人做起来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我觉得应该这样做，因为每件如意的事，都从困难中得来的。且这里开赴前方去的大都是老百姓，智<sup>[知]</sup>识程度要比我们那里差一点，这里能够干，我们那里更能够干了。我盼望余姚先进的青年人都担负起这层工作来。

你的稿子寄到后，我已写了三篇稿，一寄四川川大教授办的救亡刊物（名不详），一寄《新华日报》<sup>[16]</sup>，一寄《七月》<sup>[17]</sup>。除寄《七月》的外，余都是他们嘱我写的。我的笔名是柳夷，或许你们可以看到。

我的信不一定要发表，这一层由你决定吧。我是发表和<sup>[或]</sup>不发表都可以的。郭君<sup>[18]</sup>如能办《律报》<sup>[19]</sup>，我可经常为《律报》写稿，不过最困难的是这里的稿寄到家乡时日子太长了，要二十天左右。

关于我的盘川<sup>[20]</sup>和路上经过情形，我曾在至此给你第一封长信里告诉你，因这封信没有寄到，故而你还不知道。现在我很简略的告诉你几句：我自姚来陕，经九江时，因乘军政部差船，不能带行李，把行李都丢了，在西安重新办起来。至延尚有二十元多余。遇抗大彭年<sup>[21]</sup>借去五元。本校五队毕业同学回乡戚铁生<sup>[22]</sup>回姚时，拏<sup>[拿]</sup>去五元，其余十元在来的一月中，买书籍文具及鞋袜洗衣，助各种捐款都用光了。虽然中央（共）每月有一元津贴，但我们的学校是穷学校，都助了学校基金了。第二个月，我每天都过着身无分毫的生活。虽然我们同来的冯同志<sup>[23]</sup>有一次汉口寄了五拾元钱来，但我也没有想<sup>[向]</sup>他要分毫，只有知道我的情感最密切的朋友会帮助我。而我也不愿常用朋友的钱，在万不得已时才用他们的钱，但他们都是常自动底会帮助我的，比如我二月廿一日写的那封信吧，邮票信纸封是张同志<sup>[24]</sup>给我的。这次寄到外面去的稿，因还没有接到你的邮票，寄费都是军事科科长高同志（卢沟桥实地参战者，冯治安<sup>[25]</sup>部下的团附<sup>[副]</sup>）自动给我的。这许同志，我当然很感谢他们。本来我现在不需要人家帮助了，因我已在校工作每月中央可津贴三元（三元一月的津贴，是这里二等报酬，毛主席<sup>[26]</sup>和校长<sup>[27]</sup>也只有五元一月的津贴），但近因战事迫切，各方面都有更紧的需用，把我们（上至毛主席，下至勤务员）的津贴统统免了。不单免津贴，恐怕制服也不发了，因各方面都要节俭，非万不得已不用钱。经济虽非常困苦，但我的精神是快活的，因精神的快活，物资上的困苦也不十分感觉。

肤施一样的需要钱，各种物资都要钱来换，而且物价很高，（华<sup>[28]</sup>□□<sup>[28]</sup>1元壹瓶）二两我们家乡；大华铅□□；白报稿纸□□；40页大抄簿□□；凡打“□”的均为尚未辨识出的字。）但这在未来以前可以想到，因为这里社会建设没有开始。

文具等用品，我现在可以领了，因为我现在是教职员<sup>[29]</sup>之一了。不过有限制的，如铅笔，墨水，油光纸可领，其他如信纸信封仍要自备。

天逐渐温和，假使真不发春制服，那可糟糕，穿了棉制服太热，不穿太冷，但我觉得这许困难总可克服的，比如过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谁能穿得冬像<sup>[象]</sup>冬，夏像<sup>[象]</sup>夏呢？他们还不是冬天穿了单衣，或夏天穿了棉衣，甚至于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红绿根本不管了。我现在

每件事情都这样想的：苦了吗？并不十分苦，比我苦的要多着。这样一想，就很平常的过去了。

我在二星期前有信寄给伯善<sup>[30]</sup>，并附[附]有好几封信，给你的和给张宅<sup>[31]</sup>的。在那封信上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毕业和在校服务的情形，不过我的工作到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始，因近来校长和教长忙于第二期开始的事，我的工作计划书和预算书尚未批准：因之我这几天空得很，每天差不多写文章看书上高级研究班去听讲，和为教务科帮忙。或许我的工作要调动，调我到秘书处去，但不一定。惟照日下的情形，陕公暂不需要陈列室。

我最近不会回南方来，我要在这儿学习。我的主张暂时在校工作，有可能要求入党校，党校毕业再工作，有可能请求到苏联<sup>[32]</sup>去。大概我南来之期，或许要在建设新中国的时候。

建南<sup>[33]</sup>已有信给我，我且已有回信和稿子寄给他了。在最近的《新华日报》上或许可以看到我的文章。

彭年已在抗大毕业，何处去工作，现尚未派定，大概他不会回到余姚来，因为他自己不愿来，要留在这里。他最近有三本著作出版了，汉口出版的。假使他若留在这里工作，在暇间，我们两人预备合作写一本抗大与陕公——并已拟就大纲。这工作我们要预备在学习间做的，因时间关系，不曾把他干起来。假使彭年往他处工作去，那末我们预定写的抗大与陕公要分开来了，我预备单独写陕公生活，这我已写就初稿，要经三次修改后寄汉，请建南兄再给我修改，纠正错误，才来出版。出版的问题没有什么困难，各方面都需要这类东西，只没有时间来写。

达人<sup>[34]</sup>和马文新<sup>[35]</sup>已走了，大概可到了西安。最困难的是达人，他是不是可以到汉口？近几日来敌人炮击潼关后，龙（陇）海路<sup>[36]</sup>交通断了，他们怎样走呢？达人钱又很少，学校祇给他二十五元路费。假使他到了汉口，就没有问题，且我有介绍信给他，教他找建南去，在汉口无论如何可以找到工作做的。达人的弟弟有一封信给他哥哥，可是达人已走了，我无法转递。

昨天，我有一卷印刷品寄给你：《解放》<sup>[37]</sup>，陕公组织系统及我们编的陕公学生会半月刊《前锋》等。过去（二月十日左右）我亦有一本《列宁主义概论》<sup>[38]</sup>寄给你，不知有没有收到？这里有许许多多很前进的书和讲义，但是

否寄得到是一个问题，我不敢寄。

我最近除在学校工作外，并参加各团体。主要的是边区文化救亡协会<sup>[39]</sup>，会员多系上海回来的作家（周扬<sup>[40]</sup>、艾思奇<sup>[41]</sup>、柯仲平<sup>[42]</sup>、吕骥<sup>[43]</sup>、沙可夫<sup>[44]</sup>、任白戈<sup>[45]</sup>等）过去创造社<sup>[46]</sup>的亦有，文协内有战歌社<sup>[47]</sup>，海燕社<sup>[48]</sup>，都出半月刊，战歌社主要的工作是诗歌朗诵，这系毛主席主动。那天晚上开晚会，因参加的人，大都不懂得朗诵的意义，没有开完会走了，只有毛主席和我们主要的几位战歌社负责人没有走，战歌社陕公部分由我与高级研究班<sup>[49]</sup>一位同志共同负责，同时海燕社也将加在我的身上。只要我有时间，我这工作我都愿接受的。最近我正日夜在写稿，一方面是为了《战歌》与《海燕》的需要，零[另]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学习，写出去的稿，并可得几位作家的改正错误，这是我学习的最好机会。

对于我的家我近来一点都没有去想它。因为一个要做革命工作和做革命工作的人根本不能把家庭放在正[整]个心上的。一个革命战士的家不是狭小的家，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社会才是革命战士的家。我的母和我的妻女<sup>[50]</sup>，我当然知道在日夜想念我，希望我回来，赡养他们，但我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正[整]个社会，也祇好由她们去想念。而我呢，正为了他们的想念而走这一条路的，只有这一条才可以消减她们的想念。不但有他们，在我们所走的路到目的地时，全中国的人民都不要再想念了。而他们现在要我回来是不可能，因为我现在还只有才走上这一条路。我上面不是说过吗，在建设新中国时，或许我可以回到南方来。

写到这里，我想起我们店里的同事们，谅他们都康健，他们在今天和将来应该好好的学习，要集体学习，每个问题大家来讨论。对目前的政治要有具体的了解和真[正]确的认识。最好由他们自己规定时间，规定学习的时间，讨论问题。如他们不能解答的时候，请一位政治水准高的人为他们解答和指导，能做到这一步，等于进陕公和抗大一样。过去大家有这样的错误认识，商人不需要这一套，但在将来的社会里，你要立足，没有真[正]确的政治认识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贡献给我的亲爱的同事们的意见，请他们接受吧！谅他们都愿接受。敬致

民族解放底革命敬礼！

鸿鹄<sup>[51]</sup>17/Ⅲ<sup>[52]</sup> 38年 夜十时于陕公教务处

[1] “致姜枝先”之标题由释读者所加。此信写于1938年3月17日。信封款项所示，收信人：姜枝先先生；收信人地址：普文明图书局 浙江省余姚县新建路70号；寄信人及落款：陕西肤施陕北公学教务处陆鸿鹄编 1938.3.17；种类及编号：快信#239。信纸开头右侧附言：“ 附奉本校生活照片六张，请传阅。——系同学赠给，转赠吾师，请保留。”信尾附言：“请转言张宅，不零 [另] 书回信。请寄我37号黑色胶底鞋一双（万里鞋）这里买\$ 1.50，袜子（要牢而价廉）黑色贰双，可能的话衬衫（14半）背心（30）寄各数件。——只要牢，不要漂亮，这里说你多漂亮，就是一个耻辱。”信中凡古今字、别字、异体字均加 [ ]，并加注现行的简体字，凡属此类情况均作如此处理，下同。

[2] 姜枝先：字凤书，号昌后，晚年自号息存老人。1902年，出生于余姚通德乡姜家渡上新屋。14岁辍学到余姚城内一家小中药铺当学徒。1924年，应书店经理之聘，姜枝先入普文明图书局担任会计。店址在虞官街（今新建路）火弄口，主营古今图书、教科书。24岁时，代理普文明图书局经理之职。1927年，筹建余姚县商人统一委员会（后改组为商会），被推为筹备委员。后担任数届商会常务委员。姜枝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抗日救亡、革命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并积极支持店员柳夷、陈树谷、黄左尘、汪文元、傅煥文等5人投身革命事业，其中：陈树谷、黄左尘、汪文元献出了生命。1949年5月23日，余姚解放。6月21日，姜枝先奉命接管商会。1952年5月，余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姜枝先被选为常务委员。1954年7月，又担任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56年，余姚县政协成立后，他担任第一届至第七届的副主席。当选为第五、第六届省人民代表。曾担任县文管会副主任、文联副主席等职。1991年5月4日，90岁高龄的姜枝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3年5月23日，姜枝先逝世，享年91岁。

[3] 《余姚先贤御侮史》：作者、出版、具体内容等信息不详。凡信中的繁体字均转换为简体字，下同。

[4] 底：同“的”[de]，下同。

[5] 边区：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在陕甘宁几个省

接连的边缘地带所建立的根据地。

[6] 托洛斯基：指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斯基（1879—1940）。1879年11月7日，出生于乌克兰沙俄赫尔松省亚诺夫卡村一个犹太富裕农民家庭。曾为苏联共产党、第四国际领袖人物。

[7] 黄帝：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史载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黄帝子孙亦是华人的自称。

[8] 婊子：妓女，信中是借指汉奸、卖国贼，为贬称。

[9] 绥德：地名，位于陕西省北部，榆林市东南部。

[10] 我们学校里：指柳夷就读的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为造就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以满足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底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并于8月任命成仿吾为陕北公学校长兼党组书记。陕北公学实行党团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直属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领导，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所革命大学。

[11] 抗大：指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1937年初，改为此名，其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校址在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军事和政治干部的学校。

[12] 厨子：即“厨子”。旧时，人们称厨师叫“厨子”、“厨役”等。

[13] 肤施：古代地名，古肤施，即今之延安。

[14] 党校：中共中央党校的前身是1933年3月13日创办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的共产主义学校。1935年，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改称为“中央党校”。1937年，迁入延安。

[15] 祇：此处读zhǐ，表示“只”，“仅仅”的意思，下同。

[16] 《新华日报》：抗日战争时期创办，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大型机关报。

[17] 《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早创办的进步文艺刊物，先后出周刊、半月刊两种，由胡风主编。

[18] 郭君：指郭静唐（1903—1952），幼名寅生，又名挹青，字琴堂。余姚周巷（今属慈溪）人。1937年，受中共上海组织指派返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3月，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要求各县创办战时政治工作队，余姚战时政治工作队由此成立，郭静唐任战时政治工作队副队长，主编《战斗》周刊，宣传抗日救亡。

[19] 律报：《律报》是否开办、发行不详。

[20] 盘川：旅费。

[21] 彭年：即楼明山（1913—1941），又名楼童生。1913年11月20日，出生于余姚梨洲乡苏楼村（现属梨洲街道区划内）。初在本村学塾读书，后转入邻村姜氏完全小学，毕业后进和记书局当学徒。学徒期满后，经人介绍到上海天马书店做职员。楼明山爱好新文艺，与知识界进步人士交往密切。1931年，东北沦陷后，楼明山在上海积极参加中共领导的救亡团体。1935年8月，在散发传单时被提篮桥巡捕房拘捕，后释放。“七七事变”后，经楼适夷介绍，从上海经汉口辗转至延安，进抗大学习，学习半年后毕业南归。回余姚后，参加郭静唐领导下的余姚政治工作队。在抗日自卫会主办的会刊《战斗》和崔小立主编的《浙东日报》上发表文章，署名楼明山。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余姚县政工队中共党团委员、政工队区队长，余姚新汇乡乡长。1941年4月，潜回三北。后，奉党组织委派去定海东区任指导员兼代理区长等职。1941年农历八月，在黄杨尖战斗中，被日寇包围，经激战，于廿九日牺牲。解放后，为纪念楼明山、周之伟两位烈士，改梨洲乡名为明伟乡。

[22] 戚铮音（1909—1988）：女，又名轶生，余姚何地人不详，中共党员。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上海同济附中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民国二十五年（1936），转为中共党员。曾两次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抗日战争开始后，经营救出狱，由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送往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23] 冯同志：具体经历不详。

[24] 张同志：具体经历不详。

[25] 冯治安（1896—1954），河北省故城县人。1937年，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桥悍然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时任国民革命军29军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冯治安，毅然指挥其37师，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战斗，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日的帷幕。

[26] 毛主席：指毛泽东主席。

[27] 校长：指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笔名石厚生、芳坞、澄实，湖南新化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之一、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于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陕北后，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1950年，为主创办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

[28] □：为尚未辨认出的字，同上。

[29] 教职员：从信中可以看出，至少在1938年3月17日前，柳夷在陕北公学已由学员转为教员了。

[30] 伯善：即叶伯善（1917— ），曾化名金林、金一明，余姚人。抗战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组织了余姚商业人员工作队，任总务股长。1938年7月，在余姚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2月，叶伯善由中共绍属特委决定调任中共诸暨中心县委书记。1941年底，任中共嵊西区特派员。1942年7月，任中共嵊西县委书记。1943年5月后，调中共会稽地委、金萧地委做秘书工作。1945年9月，叶伯善随军北撤。1945年11月至1964年12月，先后在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军工作，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干部部部长、九十四师副政委、军干部部副部长、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等职。期间，参加了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历次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二次、第五次战役。先后获华东野战军三级人民英雄奖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国防部三级解放勋章。1964年12月，转业至交通部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党委书记。1983年，离休。

[31] 张宅：指柳夷妻张勉勤家。

[32] 苏联：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联邦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而成，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

[33] 建南：即楼适夷（1905—2001），原名楼锡春，建南为其笔名，余姚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1927年3月，接任蔡肖鸿任中共余姚支部书



记，是中共余姚党组织早期领导人。早年参加太阳社，曾留学日本。1931年，回国，从事左联和文总的党团工作，任《前哨》编辑，后参加反帝同盟。1933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7年出狱。历任《新华日报》社副刊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及《文艺阵地》编辑、代理主编，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浙东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新华日报》编委，《时代日报》编辑，出版总署编审局副局长，东北军区后勤政治部宣传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顾问，《译文》编委。有短篇小说集《挣扎》、《病与梦》，《适夷诗存》、《适夷散文选》等著述和译著传世。

[34] 达人：即熊达人（1910—1941），又名大嘉、杨大珈，余姚柯义乡熊家街（现地属朗霞街道）人。1937年10月，经党组织介绍，赴延安，入陕北公学学习。曾任中共余姚县工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曾兼任余姚政工队队本部干事长两年多。1940年夏，政工队被解散，熊达人撤离余姚，辗转千里，来到皖南丁家山中共中央东南局，被分配到苏皖特委任安徽广德县委委员。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熊达人在事变中不幸牺牲，时年31岁。

[35] 马文新：具体经历不详，是否为当年也在陕北公学求学的马青（1908—1989）之别称，尚待查证。

[36] 陇海路：指陇海铁路，由甘肃兰州（陇）通往江苏连云港（海）的铁路干线，于1905年起动工，分段建设，直至1952年方全线建成。1953年7月，全线通车，目前全长1759公里。

[37] 《解放》：《解放》周刊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发表政论为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洛甫（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都曾为《解放》写稿。

[38] 《列宁主义概论》：作者和出版时间等均不详。

[39] 边区文化救亡协会：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延安成立，艾思奇、柯仲平、成仿吾等为主要负责人。

[40] 周扬（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现代文艺理论家、文学翻译家、文艺活动家。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校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从事文

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

[41]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云南腾冲人，蒙古族。哲学家。“艾思奇”的名字是从英文“SH”（其英文转写Sheng Hsuen）得到灵感，并成为自己的笔名。1937年，到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副校长，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42] 柯仲平（1902—1964）：云南宝宁（今广南）人。诗人。北京政法大学肄业。1926年，到上海，在创造社出版部、狂飙社出版部工作，并在建设大学任教。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秘书、联合会纠察部秘书。1937年，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团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主任。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北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

[43] 吕骥（1909—2002）：曾用笔名有：穆华、霍士奇、唯策等。湖南湘潭人。中国著名的作曲家、理论家及音乐教育家，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30年，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学习。193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参加筹建鲁艺，曾任鲁艺音乐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副院长。1939年，组织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1945年，任东北鲁艺院长、东北音乐工作团团长。建国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主席。曾为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2001年，他获得了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颁发的“终身荣誉勋章”。中国音乐家协会一、二、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

[44] 沙可夫（1903—1961）：原名陈明、陈微明，又名维敏，字树人，号有圭，笔名克夫、古夫、明、冥冥、萨柯等。生于海宁新仓，后迁居袁花。1917年，初小毕业后就读于海宁县立第三高等小学。1920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附中，毕业后升入公学电机系，半工半读。1925年，受“五卅运动”影响，暑假回乡，组织晦明社，并出版油印刊物《红花》，宣传民主，反对封建迷信。1926年春，赴法国学习音乐。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

中共旅欧支部领导成员，编辑《赤光报》，全力从事革命活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巴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使用俄文名字：亚历山大·阿列克赛·沙可夫，后使用此译音为中文名字。1937年，抗战爆发后，奉召于10月回到延安，任新华通讯社主任，后致力于戏剧活动。1938年，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党组书记。1949年初，担任北平市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常务主席团成员兼大会秘书长，当选全国文联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后任中央文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文化部办公厅主任。1953年，任中央戏剧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45]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毕业于南充中学。1926年入党。从1930年起，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左翼文化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从事抗日军政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任、四川省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46]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7月中旬，由留学日本归来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

[47] 战歌社：1938年初，在延安群众诗歌运动发展的基础上，边区文协主持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担任社长，其成员大多是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员。

[48] 海燕社：与战歌社一样，是边区文协的组成单位。

[49] 高级研究班：陕北公学的教学组织形式设有高级研究班和普通班，柳夷就读的是普通班。

[50] 妻女：柳夷的妻子与女儿。1935年，时年23岁的柳夷，经与张勉勤自由恋爱，由姜枝先提供经费在杭州旅行结婚。1937年，生一女穆燕。

[51] 鸿鹤：即为柳夷原名，“柳夷”为其在延安学习时写稿所用笔名，后以笔名行世。

[52] “Ⅲ”，表示罗马数字中的“3”。 I、II、III、IV、V、VI、VII、

VIII、IX、X、XI、XII对应阿拉伯数字（现国际通用的数字），即为1、2、3、4、5、6、7、8、9、10、11、12。下文同，不再标注。

## 解读

柳夷原名陆鸿鹤，余姚县云漾乡二塘头漾山路村（今为慈溪市宗汉街道二塘新村）人。1913年7月23日（农历六月二十日）出生于穷苦农民家庭。柳夷3岁丧父，与寡母、姐、哥一起生活，生活十分艰难。柳夷13岁时，由堂兄陆鸿图介绍，负笈到余姚普文书局当学徒，拜姜枝先为师。普文书局的代理经理姜枝先与共产党人郭静唐、楼适夷等交往颇深，思想倾向革命，书店也成为余姚教育、文化、政治界人士聚会之处。

姜先生思想开明，店内专门辟出专柜出售左翼进步作家的书籍及相关刊物，并积极鼓励学徒们在做生意空隙间可在柜台上看书。柳夷在业师的影响下，勤奋好学，阅读了大量左翼进步文艺作品，不仅开阔了知识视野、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而且渐渐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在民族危亡之际，举国上下，抗日救亡兴起，全国军民抗日斗志空前高涨，一大批革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救国的感召下，毅然奔赴延安。1937年10月，柳夷毅然决定投奔延安，并受到业师的大力支持，与余姚另一热血青年能达人一起奔赴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到延安后，柳夷就及时给业师写信，由于战时通信困难，邮寄封件常常受到阻碍，此信件在邮传



柳夷入抗大纪念照  
生成时间：1938年5月13日  
原始尺寸：48×70mm  
档案编号：238-30-3-10  
收藏路径：柳铁燕先生捐赠

过程中丢失。尽管柳夷在延安学习、工作十分紧张，条件异常艰苦；但他还是经常写信，与业师保持书信往来。1938年3月17日，柳夷致业师姜枝先的信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写作的。柳夷给姜枝先的这封信篇幅比较长，约四千余字。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书信，是柳夷给业师数封信中内容相对丰富，史料价值极高，又具有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历史文献。



陕北公学同学聚餐  
生成时间：1937年  
原始尺寸：61×43mm  
档案编号：238-30-3-4  
收藏路径：柳铁燕先生捐赠

此信的称谓语很有讲究，称业师为“敬爱的先生枝先同志”。加入革命队伍后的柳夷对自己业师的身份认定有了进一步提升，不仅仅将自己与业师关系看成是师徒关系，而是将业师看作革命的同志，这就超越了行内的规矩。这种“先生+同志”的关系非同一般，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也为此信的内容表述作了合理的铺垫。“敬爱”

两字表达了业师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姜枝先对柳夷来说，有知遇之恩，义重胜父。柳夷年幼失父，姜枝先将父爱传递给了柳夷。姜枝先逝世后，柳夷闻此噩耗，有感痛失良师，以泪洗面，因年已80岁，未及来姚送别，嘱亲属以大花圈以示哀悼，与此同时扶弱笔写下了《缅怀先师》一文，文中柳夷叙述了先师对其的关怀和特殊的照顾，感激不已。关于支持他赴延安一事，他在文中写道：“就以上延安去来讲，我当时是一个书店的穷学徒，筹集上延安去的路费很困难。路费筹集了，我走后还有后顾之忧，家母、妻、女的抚养要待别人帮助。要不，一切理想、前途、追求都会落空，其结果是不言自明。”（见余姚市政协文史委编《姜枝先纪念文集》，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9页—第10页）从上面的这段话可看出，柳夷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以实际行动报答业

师的知遇之恩。正因为这种非同寻常的关系，柳夷在信的称呼中用“敬爱”一词，非用此词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反映出师徒之间的革命情谊，已超出了一般的师徒关系。

此信正文共有十九个自然段，信的主线条是向业师介绍、汇报自己在陕北公学学习、工作、生活等情况，副线是对余姚抗日救亡活动的关注。另外，还涉及到家庭及一些生活的细节问题，内容涉及广泛，真实地反映了柳夷自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及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一段经历。根据内容，正文大致可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自然段，此段中柳夷对业师姜枝先寄给他的学习用品、特别是看了来信中介绍家乡民族革命开展的情况后，除了抒发兴奋之情外，主要表达了自己的认识，直抒胸臆。在遥远的陕北黄土高原，远离故乡的柳夷一直关注着家乡的抗日救亡形势，当听说家乡的人们“干起来了”，他感到“快乐”，为之“兴奋”，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怎么会不快乐不兴奋呢”。从中可以看出，柳夷将家乡的抗日救亡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看中国的前途。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对远离家乡的柳夷来说也是极大的鼓舞，他感到由衷地高兴，决心在革命的队伍里，加倍努力，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实现理想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同时，柳夷敞开心扉，谈了自己对这场事关民族生存的伟大斗争的意义。他认为不能光说，而应实际去做，“是当前每个中国人每个黄帝子孙应该干的事”。柳夷还认为，在民族危机空前的时刻，如果不挺身而出同日寇作拼死的斗争，那么就会成为亡国奴、有的会成为汉奸、卖国贼。他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选择，坚信只有干才是唯一的生路，别无其他路可以走。说明经过陕北公学学习后的柳夷，此时已经具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革命意志，对形势发展的分析鞭辟入里、洞若观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北公学员的思想和理论水平。

第二部分自第二至第十八自然段，是全文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向业师介绍、汇报自己在陕北公学学习、生活以及学业结束后的去向问题。根据内容大体可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介绍陕甘宁边区抗战的形势和战况，希望余姚人民早日准备抗击日寇的侵犯。在第二自然段，柳夷简要地介绍了1937年初期的山西战场概况。当时，中国军队在晋南抵抗日寇失利后，日寇更加疯狂进攻，企图向黄河西岸推

进，占领边区绥德等地；但都被英勇的八路军消灭，粉碎了日寇的阴谋。但边区的人民仍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边区政府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个个都准备着，预备敌人再度进攻”，时刻准备“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在信中，柳夷高度赞扬了边区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斗志，抒发了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少的朴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作为陕公和抗大的全体师生也同样准备着，与边区人民一起与日寇作战。柳夷的介绍，反映了抗日战争的艰巨和对日作战必胜的信念，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参与，人人都在拼死一搏，其意也在鼓舞家乡人民的抗战，关键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余姚还属于国统区。在第四自然段，柳夷一再希望家乡“赶快准备”，他认为主要做好三方面的事：一是动员全县人民参加抗斗争，最少也要动员五六千人；二是要依靠有军事知识、意志坚定的人来指挥；三是不要担心武器问题，要克服困难。柳夷通过边区军民的抗日勇气和智慧鼓励家乡民众做好准备，并盼望余姚热血青年都担负起这一历史的责任。可见，柳夷对家乡的抗日斗争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从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审视家乡人民如何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应对形势的变化，非常具有战略眼光。

第二、向业师介绍陕公的教育教学情况。在第三自然段，柳夷概括性地描述了陕公全体教职员紧张的工作、学习情况。一是教学活动时刻处在临战状态：“校长，教职员，学员，伙夫、卫兵、勤务及一切工作人员，个个都是战时状态，个个都准备作战。”所有人员同战士们一样，肩负包裹行军露营，爬山跑路，在行军的间隙上课，包裹就是学员的凳子，膝盖当书桌。每天的必修课就是训练爬山，从荆棘中踏出一条路来，谁都不曾叫一声苦。夜半，在睡梦中一有紧急集合，就跑路爬山。塞北的寒风刮着每个人的脸，冷气袭人，但每个人的血都是沸腾的，这些都是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准备。只要日寇来犯，就与军队一起作战。柳夷在信中表达了为抗日救亡已置生死而不顾的决心，可见陕公是十分重视实战训练和为革命而牺牲的教育。毛泽东曾高度评价陕公的教育：“陕公在，中国不会亡”，是有依据的。

第三、向业师汇报在陕北公学学习、生活情况。柳夷在3月9日收到业师寄给他的稿纸，到3月17日前，短短的数天中就写了三篇稿，分别投给当时抗日救

亡的刊物《新华日报》、《七月》等，足见他以笔作武器高昂的战斗意志和勤奋写作的精神。同时，也可看出，柳夷当时在抗日救亡的媒体中已有了一定的影响，刊物主动向他约稿。另外，“柳夷”是笔名，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柳夷”代替了本名“陆鸿鹄”。可见，投奔延安完全改变了柳夷的生命轨迹，在革命的队伍中，柳夷开始了新的人生航程。

柳夷在陕北公学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非常丰富。在信中可以看出柳夷积极参加各种团体的活动，主要是参与文协办的“战歌社”、“海燕社”这些抗日救亡团体的活动。其中，还提到毛主席也积极参与战歌社的活动。柳夷还是“战歌社”、“海燕社”陕公部分的具体负责人之一。他还废寝忘食地写稿，



陕北公学师生合影  
生成时间：1937年  
原始尺寸：53×36mm  
档案编号：238-30-3-7  
收藏路径：柳铁燕先生捐赠

工作积极性非常高涨。他虚心向学者、行家学习，并把此作为提高的机会，为自己今后提高工作水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陕北公学，尽管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难，但柳夷内心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他在给业师的信中，说到一件事：因寄信没有钱买邮票，

是军事科科长高同志出的寄费。虽是小事，从中说明了延安当时经济困难的程度，以及战友们之间的无私帮助。信中，柳夷还介绍了延安生活条件的极端困难。诸如，虽然规定教员有每月三元的津贴，但因经济困难，其实是没有保证的。连党中央的毛主席、陕北公学的校长也只有每月五元的津贴，同样也没有保障。从另一个角度看，延安的高层领导与普通战士在生活待遇上的差别甚微，没有一点特殊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官兵一致，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信中还提到制服问题，不能按时发放：“天逐渐温和，假使真不发春制

服，那可糟糕，穿了棉制服太热，不穿太冷”。面对这些困难，柳夷是怎样对待的呢？他说：“但我觉得这许困难总可克服的，比如过去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谁能穿得冬象冬，夏象夏呢？他们还不是冬天穿了单衣，或夏天穿了棉衣，甚至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衣服，红绿根本不管了。我现在每件事情都这样想的：苦了吗？并不十分苦，比我苦的要多着。这样一想，就很平常的过去了。”面对这种难以想象的生活条件，柳夷以红军为榜样，乐观对待。他在信中还提到延安物质的匮乏与物价之高，例举了一些文具的价格奇



柳夷（右边站立者）与抗大同学在一起  
生成时间：1938年  
原始尺寸：59×47mm  
档案编号：238-30-3-15  
收藏路径：柳筱燕先生捐赠

高，学员还要自备；但柳夷都能正确对待。他说：“经济虽非常困苦，但我的精神是快活的，因精神的快活，物资上的困苦也不十分感觉。”正因如此，柳夷在延安革命的熔炉中得到了锻炼，这对他的成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以此告慰业师及家乡父老，有这样的党和军队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够战胜，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

第四，向业师谈了以后的去向问题。柳夷通过在陕公数个月

的学习及工作后，得到了锻炼，思想上、工作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对自己以后路怎么走有了打算。他在信中对业师坦率地谈了今后的工作打算：“我最近不会回南方来，我要在这儿学习。我的主张暂时在校工作，有可能要求入党校，党校毕业再工作，有可能请求到苏联去。大概我南来之期，或许要在建设新中国的时候。”从中可以看出柳夷革命志向远大，深感自己的不足，想通过继续深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更好地为革命事业工作，将革命进行到底。柳夷的革命信念，也可通过其在正确对待革命与家庭关系上强烈地表现出来。柳夷以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为重，舍小家为大家，宁愿牺牲自己的家庭利益而献身革命事业。他在信中对业师说：“因为一个要做

革命工作和做革命工作的人根本不能把家庭放在整个心上的。一个革命战士的家不是狭小的家，是广大的社会，广大的社会才是革命战士的家。我的母和我的妻女，我当然知道在日夜想念我，希望我回来，赡养他们，但我为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为了整个社会，也只好由她们去想念。而我呢，正为了他们的想念而走这一条路的，只有这一条才可以消减她们的想念。不但是有他们，在我们所走的路到目的地时，全中国的人民都不要再想念了。而他们现在要我回来是不可能，因为我现在还只有才走上这一条路。我上面不是说过吗，在建设新中国时，或许我可以回到南方来。”正是柳夷这种坚定的革命信念，自投身革命后直到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期间一晃八年。1945年，此时柳夷已是酒宿纵队政治处主任，写信给他妻子张勉勤，要其带8岁的女儿穆燕去安徽酒宿青阳镇团聚。在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张勉勤携女儿冲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经九昼夜，才来到酒宿驻地的丈夫身边，家人团聚。其妻张勉勤事后曾回忆说：“她将到营地时，见到一个骑马的军人，速度由快变慢，到他面前停下来。已不认识一身戎装的军人竟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丈夫，8岁的女儿更不认识自己的爸爸。”柳夷能正确处理革命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反映出他高尚的牺牲精神，那种为民族解放事业不顾自身利益，弃小家而顾大家的革命激情和理想。

另外，柳夷在信中还提到了当时从余姚赴延安，业师所赠路费的开支情况。在柳夷到达延安后，即给业师写过一封长信，信中专门写到一路的经过以及路费的开支情况，由于战时邮政的问题，此信没有寄到余姚。为此，柳夷又在此信中简略地提了几句：“我自姚来陕，经九江时，因乘军政部差船，不能带行李，把行李都丢了，在西安重新办起来。至延尚有二十元多余。遇抗大彭年借去五元。本校五队毕业同学回乡戚铁生回姚时，拿去五元，共余十元。在来的一月中，买书籍文具及鞋袜洗衣、助各种捐款都用光了。虽然中央每月有一元津贴，但我们的学校是穷学校，都助了学校基金了。第二个月，我每天都过着身无分毫的生活。”可以看出，当时业师资助的路费，柳夷到延安不久已全部开支完了，其中包括余姚在延安学习的老乡楼彭年、戚铁生的融资。可以说，当时姜枝先资助柳夷的路费，在余姚同乡的身上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这恐怕是姜枝先当时没有想到的。柳夷在信中对奔赴延安途中的简要过程以及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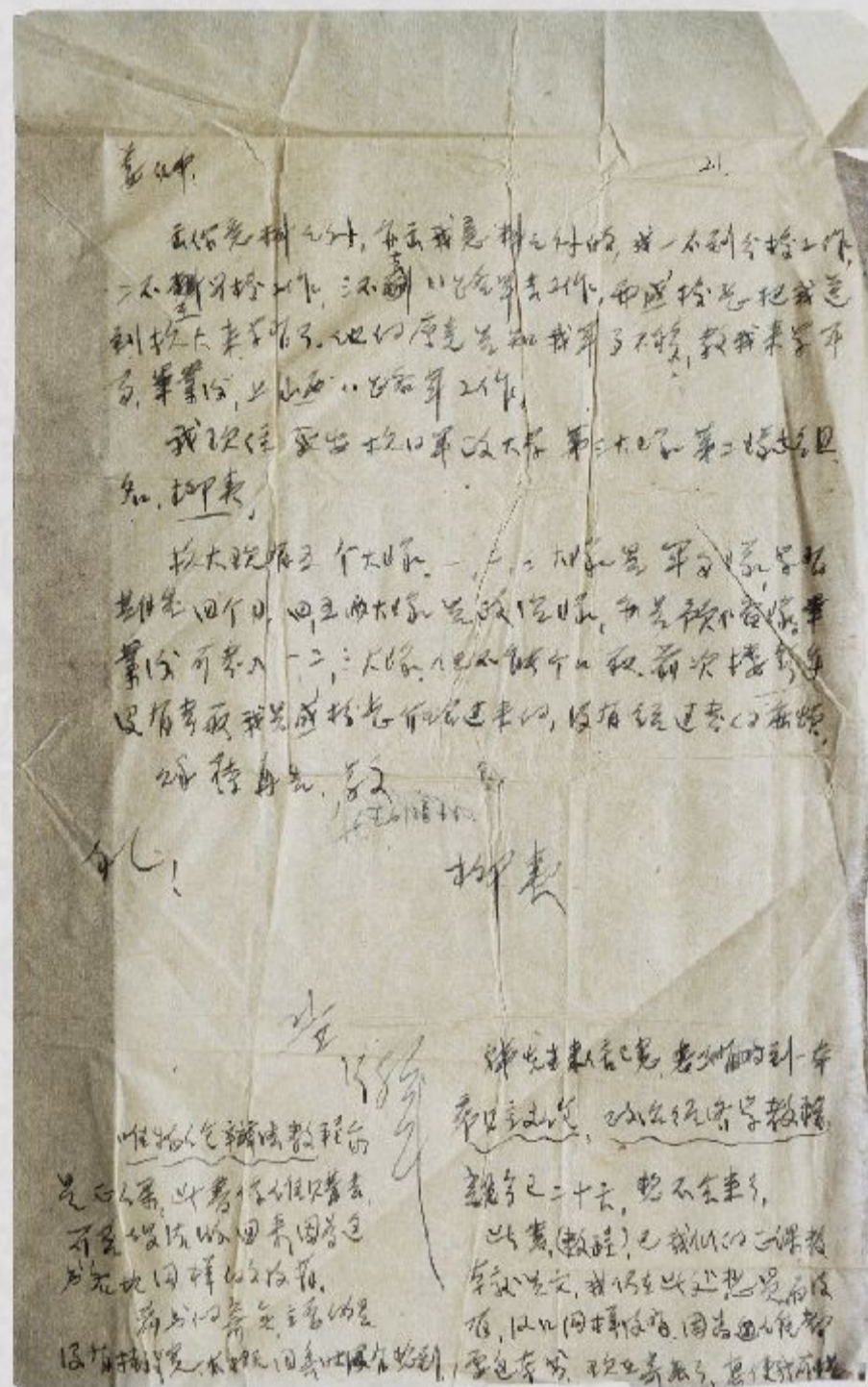
姜枝先资助的路费开支情况的介绍，也澄清了后人的一些误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部分，也是信的最后自然段，对普文书局的老同事提出了几点希望。柳夷自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后，并没有忘记那些还在书店做事的伙伴，他时刻惦念着他们，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在柳夷看来，在抗日救亡的时代潮流中，提高思想认识是十分重要的，他殷切地希望伙计们能在当今和将来的社会中立足“应该好好的学习，要集体学习，每个问题大家来讨论。对目前的政治要有具体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最好由他们自己规定时间，规定学习的时间，讨论问题。如他们不能解答的时候，请一位政治水准高的人为他们解答和指导，能做到这一步，等于进陕公和抗大一样。”柳夷是姜枝先的大徒弟，他对师弟们的关心和嘱托是有远见的，从思想上关心他们一同成长。也因为柳夷的此番苦心，余姚普文书局中有5位店员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有3人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

总之，此信对于研究当年余姚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信中提到了余姚热血青年楼彭年（明山）、熊达人、戚铮音（铁生）等人在延安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余姚人民为抗日救亡运动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此信也是认识和研究中国人民为什么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有力佐证。同时，也为认识、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缩影，以及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为培养大批抗日救亡干部举办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的直接史料，此信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值得一提的是，柳夷通过书信对延安的抗日救亡活动情况进行了生动地介绍、以及将有关抗日救亡的刊物书籍寄到余姚，起到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效果，沟通了延安与余姚的联系，其作用也不可小觑。在写作上夹叙夹议，叙事清晰，说理透彻，语言质朴。

（附注：本件和书中其它部分刊用的柳夷、楼明山及反映陕西公学与抗大的图片均为柳夷之子柳铁燕捐赠；有关柳夷的家庭情况，参考陈克华《我所认识的柳夷》一文，见慈溪市老干部局网页。）

## 二、致姜枝先（1938年5月21日） (一)



原件尺寸：183×295mm  
档案编号：232-1-114-8-1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二)

来信：
   
 至陈公，刚收来信，陈公因寄给我一封
   
 你给我的信，重新整理完却收到了。原来我
   
 寄给陈公的信，你收错了。
   
 我次生不回来，因已在抗大开始，再写
   
 信给你。
   
 抗大生活虽艰苦，但精神上是很愉快的。
   
 即使最困难的，因粮食不足，饭菜不能饱，
   
 普通吃一碗小米饭，菜更不用说了。
   
 现在已来一周，我因任了教主任(军事训练)
   
 的工作比较忙。
   
 逢人说到抗大工作，希望他加倍努力，
   
 我有时打回信，也请他
   
 详细再告。致 敬 柳 夷 书

原件尺寸：118×163mm  
 档案编号：232-1-114-8-2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信封

原件尺寸：89×149mm  
 档案编号：232-1-114-8-3  
 收藏路径：姜越才先生捐赠

## 释文

## (一) [1]

姜师<sup>[2]</sup>：

出你意料之外，亦出我意料之外的，我一不到分校<sup>[3]</sup>工作，二不在母校<sup>[4]</sup>工作，三不去八路军去工作，而成校长<sup>[5]</sup>把我送到抗大来学习了。他的原意是知我军事不够，教我来学军事，毕业后，上山西八路军工作。

我现住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二队七组。名，柳夷。

抗大现有五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军事队，学习期是四个月。四、五两大队是政治队，亦是预备队，毕业后可考入一、二、三大队，但不能个个取。前次楼彭年<sup>[6]</sup>没有考取，我是成校长介绍过来的，没有经过考的麻烦。

余待再告 敬

礼！

柳夷

21/V 38年

[1] 1938年5月21日，此信封内装有两封信，此为其一。据柳夷致姜枝先信信封款项所示，收信人地址：浙江余姚普文明书局；收信人：姜枝先先生钧启；落款：18/V 38年肤施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大队第二队 柳夷缄。陕西肤施寄出的邮戳时间为（民国）廿七年（1938）五月廿二日；信到达余姚时间邮戳为（民国）廿七年（1938）六月八日。此信信封落款时间与信落款时间在逻辑上不符，据肤施邮戳所示时间为5月22日，与信的落款时间逻辑上相符，可以推定信封所示时间有误。

[2] 姜师：即指柳夷业师姜枝先。

[3] 分校：指抗大所办的分校。

[4] 母校：指柳夷此前求读过的陕北公学。

[5] 成校长：即指成仿吾。

[6] 楼彭年：即楼明山，生平事迹介绍同前。

## (二) [7]

姜师<sup>[8]</sup>：

至陕公<sup>[9]</sup>，刚想发信，陕公同事交给我一封你给我的信，并邮票、汇票<sup>[10]</sup>都收到了。汇票我当转交校长，待收校后寄奉。<sup>[11]</sup>

我现在暂不回姚，因已在抗大<sup>[12]</sup>学习，再[在]毕业后再说。

抗大生活比陕公严格刻苦，尤其是入的是军事队更苦，但精神上是快活的。最感困难的，因粮食不多，饭常常不能饱，普通吃二碗小米饭常常的事，菜更不用说了。

现已上课一周，我因任了救亡室（等于学生会）<sup>[13]</sup>的工作比较忙。

达人<sup>[14]</sup>现在姚工作，希望他加倍努力，我有机会当回乡服务也。

详情再告，敬礼！

21/V 38年 柳夷

[7] 此信与前信装在同一信封内，此为其二。

[8] 姜师：同前。

[9] 陕公：即陕北公学简称。

[10] 汇票：通过邮局汇寄钱款的单子，与银行汇票是不同的概念。

[11] 待收校后寄奉：陕北公学收到柳夷转交的汇票即致鸣谢信如下：枝先先生：今由陆鸿鹄同志交来先生热心捐助本校基金拾元整，除登报鸣谢外，特此函谢，收据已由陆同志取去，不久当可寄上我寄去之捐册，如不能进行募捐，而请退回，以清手续。致民族解放敬礼！陕公募款委员会启 5月3日（参见余姚市政协文史委编《姜枝先纪念文集》第109页）

[12] 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

[13] 救亡室：即抗大学员队的俱乐部，柳夷注为“等于学生会”。

[14] 达人：即熊达人，生平事迹介绍如前。